

## 主義知識的旅行：

### 「小冊子」與五四前後四川的無政府主義

李世鵬<sup>\*</sup>

#### 摘要

五四以後，隨著新知識的傳入，四川的新思潮迅速形成，「主義」也來到了人們的生活世界。無政府主義在這一時期的四川特別具有影響力，其傳播離不開眾多「小冊子」。經由閱讀，許多四川新青年在五四前後成為了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不僅刺激著青年們的思想世界，也推動他們進行實踐。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前後四川流行的無政府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本義存在區別，許多追隨者對這一思潮的認識也處於朦朧的狀態，但這並不影響這些主義青年熱心於辦社、宣傳，進而成為無政府主義的傳播者。在信從者的努力之下，主義知識不斷流動，四川無政府主義的網路逐漸形成。無政府主義在五四前後四川的傳播史，展現的正是新文化「地方化」的過程。

關鍵詞：五四、四川、無政府主義、小冊子、閱讀

---

\* 作者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



## **The Travelling of the Knowledge about “-ism”**

### Pamphlet and Anarchism in Sichuan arou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hipeng Li<sup>\*</sup>

#### Abstract

New thoughts began to take shape in Sichuan as new forms of knowledge were introduce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sm” became embedded in the everyday life of locals. The popularity of anarchism in Sichuan owed in no small part to the “pamphlets” (*xiao cezi* 小册子). New youths in Sichuan became anarchist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reading. For them, anarchism not only challenged their intellectual underpinnings but also stimulated their actio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anarchism as was popularized in Sichuan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anarchism as a political philosophy doctrine. Many of the Sichuan “anarchists” were not well-versed in anarchist thoughts. However, that inarticulacy did not prevent them from founding societies and mobilizing resources to disseminate anarchism. With their efforts, the knowledge of “-ism” traveled throughout Sichuan and eventually formed a network for

---

<sup>\*</sup> Graduate Student,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communication of anarchist thoughts. The history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anarchist knowledge in Sichuan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s a process of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new culture.

Keywords: May Fourth Movement, Sichuan, anarchism, pamphlets, reading

## 主義知識的旅行：

### 「小冊子」與五四前後四川的無政府主義<sup>\*</sup>

李世鵬

#### 緒論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進入了「主義時代」，<sup>1</sup>然而在「主義」時代初至之時，形形色色的「主義」如何來到人們的生活，身處其中的人們又怎樣感知，這些問題似還有繼續探究的必要。

1920年，合江的十六歲少年盧劍波（1904-1991）正在上中學二年級。與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彼時他是一個趨新的少年——用白話文寫作，讀西方書刊，渴求新奇的名詞。<sup>2</sup>一天，盧劍波偶然在老

---

\* 本文初稿曾提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北京魯迅博物館「在文學與歷史之間：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學術研討會」，承諸位評閱老師指正。《東亞觀念史集刊》的評閱老師也提供了專業、豐富的指導意見，筆者獲益良多。本文寫作中，四川大學羅志田教授悉心指導，陳默老師提供寶貴建議，此外，盧萬儀先生、安井伸介老師與張顏釗、韓晶晶、王藝純、冉艷紅、徐陽、羅心壹、丁捷、張官鑫等師友均給予大力協助。謹致謝忱！

<sup>1</sup> 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39。

<sup>2</sup> 盧劍波（1904-1991），四川合江人，曾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1949年以後長期從事世界史教學工作，也長期致力於世界語推廣。不過少為人知的是，盧劍波曾是中國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先後主編知名的無政府主義

師李宗泌的桌上發現了《紅潮》、《適社意趣》、《味爽軒一夕讀》（即《味爽軒一夕談》）等書刊，便悄悄將它們拿走，熬夜將其讀完，他讀後「腦子裡大受震動，心裡撲通撲通地跳，當夜很少睡覺」。<sup>3</sup>這是少年盧劍波接觸無政府主義的開始，之後他與這位青年老師不斷討論，逐漸成為了無政府主義者。

對於身處內地四川的少年盧劍波而言，幾本小冊子給他帶來了「主義」，由此他的生活改變了。這樣一個個案為我們呈現出小冊子的閱讀在無政府主義的地方流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盧劍波提到的《適社意趣》、《味爽軒一夕讀》為四川早期無政府主義團體適社的印刷品，這些讀物也是四川無政府主義傳播中的重要媒介，我們不妨從這幾本小冊子開始，追尋盧劍波及更多四川青年的「無政府主義」知識從何處來，這些知識又怎樣影響了他們。

書刊對於新文化的傳播非常重要。1922年王右木（1887-1924）總結五四時期主義傳播的經驗時，便認為在四川「陶冶新分子」主要就是「在於書籍」。<sup>4</sup>在五四時期四川新思潮及無政府主義的傳播中，書刊閱讀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達恩頓（Robert Darnton）的豐碩研究成果早已揭示了書籍閱讀與社會變革二者的複雜關係，在氏著《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中，他就嘗試回答禁書與革命的關聯性，這種關聯無疑是十分微妙的，它更多的是發生在人們的心靈深處。從把握讀物到發現閱讀的讀者及其閱讀到的內容、閱讀產生的社會後果等，或許我們能夠更深入到時代思潮的內部進行觀察。即如達恩頓（Robert Darnton）所言：「通過發現全社會的讀者接觸的是什麼書以及讀者

---

刊物《民鋒》、《黑瀾》、《時與潮》、《驚蟄》等。

<sup>3</sup> 盧劍波：《回憶瑣記》（盧萬儀整理本），盧萬儀先生家藏，頁7。《回憶瑣記》為盧劍波先生1980年代末所寫回憶錄，盧萬儀先生加以整理，後慷慨惠示筆者。頁碼為筆者自編。

<sup>4</sup> 王右木：〈王右木致團中央負責人的信——關於成、渝、川北團的籌建情況〉（1922年10月11日），收於中央檔案館等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群團文件）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北京：中央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1986年），頁8。

(至少在某種程度上) 如何理解這些書，人們可以把文學作品作為公眾文化體系的組成部分進行研究」。<sup>5</sup> 不過目前對於五四前後四川青年閱讀史的研究仍很不夠，<sup>6</sup> 也缺少從知識閱讀與傳播的視角來觀察四川無政府主義<sup>7</sup> 和新思潮的著述。一個原因便在於閱讀與傳播相關史料的不易得。本文所徵引的材料多為後來的回憶，<sup>8</sup> 以及時人的日記、文章等，希求以此還原出當時新思想學說的閱讀、傳播諸過程。

通過對這一過程的梳理，我們還可以看到新思想與新知識在地化的狀況，即五四時期新思想、新文化以及這時出現的「主義」如何在四川流動，<sup>9</sup> 而身處其中的人們又如何感知，作何想法，怎樣應對。

---

<sup>5</sup> 羅伯特·達恩頓 (Robert Darnton) 著，鄭國強譯：《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

<sup>6</sup> 對五四新文化的閱讀史或地方性知識的挖掘，已有不少論著，如 Wenhsin Yeh,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蕭邦奇 (Robert Keith Schoppa) 著，周武彪譯：《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玄廬)傳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與邊緣——《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個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頁54-72；張仲民：〈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在地化〉，《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瞿駿：〈新文化運動中的「失語者」——論凌獨見與五四時代〉，《學術月刊》2016年第4期，頁158-168；瞿駿：〈新文化運動的「下行」——以江浙地方讀書人的反應為中心〉，《思想史》第6輯(臺北：聯經，2016年)。關於四川新文化的傳播，可參看梁娟：《五四前後四川的文化氛圍與新文化的傳播——以華陽書報流通處、〈星期日〉及校園新文化為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sup>7</sup> 目前對四川無政府主義傳播史研究最佳者應屬盛明的〈無政府主義在四川的流傳〉(《四川黨史》1995年第31期，頁45-48)；對於四川無政府主義的組織問題，管文虎的〈試述成都早期無政府主義組織的革命活動〉(《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頁67-75)亦相當詳細地介紹了成都地區的結社情況。

<sup>8</sup> 這些回憶文字多誕生於1949年以後，其時無政府主義已經負面化，不過也因於此，那時對於1949年以前無政府主義經歷回憶的褒揚部分，反而可信；至於回憶中的貶謫或諱莫如深之處，筆者則另用其他史料加以甄別。

<sup>9</sup> 關於思想的流動的相關理論，可參看郭雙林：〈流動的思想：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方法芻議〉，《史學月刊》2019年第6期，頁12-16。

## 一、思想的流動：四川無政府主義思潮的開啟

梳理無政府主義在四川的流布，須從魯哀鳴(??)的小說《極樂地》說起。《極樂地》是民初的幻想小說，講述了民國初年社會動亂中上海一位宣傳共產主義的「白眼老叟」舉行武裝起義的故事：在政府圍剿下，老叟起義失敗，後逃至一名為「快樂地」的島嶼——一個人人平等、生活富足的無政府共產社會。老叟深受震動，決心回國依樣建成「快樂地」，時逢中國社會黨的建立，於是他加入其中，發起革命。<sup>10</sup>該小說由漢口的無政府主義團體人道學社出版，如同法國大革命前的烏托邦小說《2440年》一樣，這部講述幻想世界的書自民國元年以後被一再翻印，非常暢銷，<sup>11</sup>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

後來有無政府主義者講述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史時，曾這樣評價《極樂地》：

一著《極樂地》一書以為傳播之工具，旋還于長江流域各省，辦新村于江西，執教鞭于湖北，皆其傳播之歷程也。繼而小我等樹益社之于四川達縣，設醫院以容納同志，當時雖無多大成績可言，然其種子已下，潛隱之勢力已在其中伏滋暗長矣。自此以後，安那其之團體接踵而出，在四川則有適社、人聲社、半月社、均社、滄隆明社、民鋒社、同社、無共社、青年互助團、紅社、引社、平平社、益社；在湖北則有武漢明社、人道學社……。<sup>12</sup>

從這則史料中我們可以認識到《極樂地》之於中國無政府主義以及

---

<sup>10</sup> 見哀鳴(魯哀鳴)：《極樂地 社會主義小說》(漢口：人道學社，1912年)。

<sup>11</sup> 鄭佩剛：〈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若干史實〉，收於葛懋春、蔣俊等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961。

<sup>12</sup> 參見曉星：〈怎樣宣傳安那其主義(未完)〉，《國風日報·學匯》(北京)第155期(1923年3月31日)，頁1。



四川無政府主義發展的重要意義。遺憾的是，關於《極樂地》何以印刷、流布，史料記載付之闕如。<sup>13</sup> 目前所知的是，《極樂地》在印行的當年（1912）即從漢口流傳到位於川東的達縣，當時正在縣城讀中學的學生陳慕勤（1892-1933，後改名陳小我）便讀到了這部小說，並深受其影響。在全國性的無政府主義熱潮影響下，他又陸續接觸了劉師復（1884-1915）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宣言書》等小冊子，由此而更加嚮往無政府主義。不論是《極樂地》中的桃花源想像及暴力革命還是師復的「組織自由共產之社會」宣言，都令其著迷。《極樂地》中的主張與劉師復、克魯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 1842-1921）的學說自然並不相同，但一致的是他們都指向了一個「大同」而均平的理想社會，這或許才是陳慕勤為之傾倒的原因。

陳慕勤大量閱讀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巴枯甯（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 1814-1876）、克魯泡特金等人的著作，而劉師復的〈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與手段〉一文啟示了他需要將無政府主義傳播至一般民眾，且鼓起「眾人起事」的風潮。接著他開始將思想的震動轉化為實踐的努力，立即籌資石印無政府主義的通俗讀物，手抄《極樂地》、《改造社會》等無政府思想冊子，在親友中散發。<sup>14</sup> 這些行動在達縣內部引起了較大反響，如教育局的青年官員戴治安、達縣中學的教師張鯉庭（1887-1933）、馮質彬（1886-1932）等均參與到傳播無政府主義的行動中，他們開始秘密散發禁書《極樂地》等。接著在1917年，陳慕勤在達縣發起

<sup>13</sup> 1922年，北洋政府曾發出通告查禁人道學社印行的《救世音》等印刷物，在這份文件中，《極樂地》亦在列。有趣的是，該次查禁自中央傳達至各省執行，卻除去了四川、廣東、廣西、雲南等六省。這揭示出北洋時期中央對地方統治的缺位，也揭露出四川由於長期軍閥混戰而獨立於中央的事實。

<sup>14</sup> 唐敦教、陳國衡：〈陳慕勤傳〉，收於中共達縣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鳳麓忠魂 達縣市革命英烈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09-118。

「適社」，主張建立人類最適宜之社會，且無首領、徒眾、總部、支部各階級，<sup>15</sup> 成為四川地區第一個無政府主義團體。這也是無政府主義網路在四川的第一個節點。在1910年代，通過陳慕勤等人的傳播，無政府主義有了一些小範圍的受眾，不過多局限在達縣周邊，並未在省內形成氣候。

五四時期，整體風氣偏舊的四川受到衝擊，一時間「各種思潮，有人宣傳，有人著書立說，新的雜誌，新的著作在青年中受到歡迎。巫山夔門，都封鎖不住」。<sup>16</sup> 憑藉「重慶華洋書報社」等書籍流通場所與便利的水運交通，重慶很快便有大量新書刊的出現。在重慶的青年朱近之（?-?）及其朋友，就通過在上海中國公學的吳芳吉（1896-1932）訂購了《新青年》、《新潮》等十幾種新書報。<sup>17</sup>

當時楊森控制川東地區，大力任用有新思想的人士，也為重慶的新文化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在楊森（1884-1977）的支援下，少年中國學會的參與者陳愚生（?-1923）出任川東道尹公署秘書長。陳氏到任後即撤換了重慶幾所學校的校長，把具有新思想的熊波（?-?）、張方谷（?-?）、沈德（?-?）等人分別委派到重慶聯中、川東師範、巴縣中學校主政。這些新校長又任命了一大批新教師。<sup>18</sup> 1921年，陳愚生等人先後成立了新文化叢書社、新文化印刷社，創辦了《新蜀報》，為重慶的閱讀文化提供了有力支援。由此，學生們在課堂內外均能接受新知，校園內的知識傳播、討論等便得以熱烈展開。

---

<sup>15</sup> 〈適社的意趣和大綱〉，收於葛懋春、蔣俊等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頁529。

<sup>16</sup> 盧劍波：〈在合江中學領導罷課抗議軍閥侮辱學生的鬥爭實錄〉，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合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等編：《合江縣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合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合江縣委員會，1988年），頁76。

<sup>17</sup> 朱近之：〈白屋詩人吳芳吉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收於江津縣文化局編：《吳芳吉逝世五十周年紀念集》（江津：江津縣文化局，1984年），頁47。

<sup>18</sup> 周勇主編：《重慶通史》第2冊（重慶：重慶出版社，2014年），頁18。

五四時期重慶新知識的傳播真正得到了本地社會力量的支援。有了陳愚生的直接推動，各校也得以由崇尚新文化的人物所掌控。學生們在學校中即能受到各種主義的教育，如重慶聯中的校長李峙青（?-?）等就曾以無政府主義學說中的「愛力」作為招考學生的題目，<sup>19</sup>官方的導向可見一斑。在學校裡，通過各種途徑獲得新刊物後，不同的同學「一樣閱讀起來」，這些學子之間「就以這種因緣而漸漸接近」，還成為「相知的親切的朋友」。大量的「新知識讀書會」和「青年讀書會」等小團體得以建立，「益社」等無政府主義社團也在這一過程中發起。

在重慶各學校重用新青年的情況之下，陳慕勤從達縣來到重慶（當時他已更名為「小我」），開始時他仍繼續以印刷讀物的方式傳播無政府主義。朱近之此時曾與陳小我有過接觸，陳小我就是在這時給了他《告少年》和《極樂世界》等小冊子。<sup>20</sup>（此處朱近之記憶中的《極樂世界》應當就是《極樂地》）隨後陳小我應聘擔任重慶聯合縣立中學監學，並編寫了前文提到的小冊子《味爽軒一夕談》。因為五四時期與重慶學生站在同一陣線，陳小我在學生中具有了很高威信，還被推選為川東學生聯合會領導人之一。藉由自己的影響力，他聯合廖劃平（1891-1951）、杜小馬（?-?）、徐敦讓（?-?）等又建立了重慶適社。<sup>21</sup>這時的「主義」傳播便轉為以社團為中心了。重慶適社印製了《適社意趣》等小冊子，成為川東地區無政府主義傳播網路的中心。1922年11月11日，《川報》刊載的〈川東學聯參加裁兵促進會宣言〉中提到：「加入裁兵促進會」，「我們全川同胞，從此可以到極樂地享

<sup>19</sup> 危石頑：〈回憶參加革命活動的經歷〉，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1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6。

<sup>20</sup> 朱近之：〈我的政治生活歷程〉，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五四運動在重慶》（重慶：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內部發行，1984年），頁326-328。

<sup>21</sup> 唐敦教、陳國衡：〈陳慕勤傳〉，中共達縣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鳳麓忠魂達縣市革命英烈傳》，頁109-118。

無窮的幸福」。<sup>22</sup> 便可以明顯看到經由陳小我等人的努力，《極樂地》小說對於川東地區的無政府主義者已有相當深刻的影響。

在無政府主義發展的同時，新文化也帶來了其他主義學說，譬如共產主義在當時也獲得了部分民眾的青睞。在《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近些年來，四川出現了名目繁多的組織。其中大多數由政客所組成，他們企圖利用這些組織來實現資本家和軍閥的願望。但是，重慶的共產主義組織情況卻不同，因為我們的組織是由一些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教師所建立的。他們起初成立了一個研究會，在這裡聚集了一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大學生。我們小組的組員一直與其他地方的大學生通信，因而又影響了某些大學生，他們也請求加入我們的研究會。由於這種情況，再加上絲廠和毛加工作坊的罷工，使得一些工人加入了我們的隊伍，有必要把我們的研究會改組為更有權威的組織。於是，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我們的組織在重慶正式成立了。<sup>23</sup>

依照這份文獻記述，幾乎與陳小我等人同時，共產主義組織便已在重慶出現，但誠如中共黨史研究者李蓉所言，由於種種原因，該組織僅是「曇花一現」。<sup>24</sup> 也就是說，雖然在1920年重慶就已經出現了一批共產主義者，且他們同樣熱心於傳播共產主義，然而，其發展情況卻不甚理想。甚至直到1924年四川共產主義先驅人物吳玉章到北京時，他才知道中國共產黨業已成立。此外，四川早期共產主義者王右木1922年仍感歎「重慶有為青年，無處不見是已入安那

<sup>22</sup> 〈川東學聯參加裁兵促進會宣言〉，收於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五四運動在重慶》，頁264。

<sup>23</sup> 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資料（修訂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9。

<sup>24</sup> 李蓉：〈對《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的再考查〉，《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期，頁48。

其」，「重慶除了安派外，另無有人」。<sup>25</sup> 此語出自共產主義者之口，它表明了無政府主義較之於其他主義在重慶的影響力之大，當為更可信的憑證。到1923年，童魯（1899-?）請求劉仁靜（1902-1987）等設法為重慶提供《社會主義討論集》一書，因為他說該書在重慶是「可比無政府黨之極樂地小說」之著作，而「此地無政府黨異常之多，印刷物亦不少，吾主義之印刷物又少，且如社會主義討論之有力印刷物一本都無」。<sup>26</sup> 這不僅仍舊說明了無政府主義直到1923年左右在重慶地區依舊大有影響，而且也印證了《極樂地》一書對於四川無政府主義具有重要意義。

## 二、「主義」的降臨： 五四時期成都的閱讀與無政府主義團體

除重慶外，「五四」以後，新思潮也影響到成都。<sup>27</sup> 如李劫人（1891-1962）所說：「世界的新潮正從大西洋裡飛也似的翻滾而來，在東亞大陸沿海的地方受了這一番震盪，都激越起無數波濤澎湃的聲音。那雪練似的長江，仿佛成了渡越『世界新潮』的電線，竟自衝破了夔門——巫峽——灩澦堆的灘頭，筆直的透到細流縱貫的成都，也微微發出一些兒聲響」。<sup>28</sup>

---

<sup>25</sup> 王右木：〈致團中央負責人的信——關於成、渝、川北團的籌建情況〉（1922年10月11日），收於中央檔案館等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群團文件）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頁13、15。

<sup>26</sup> 童魯：〈童魯給劉仁靜、林育南的信——關於重慶工人罷工〉（1923年11月14日），收於中央檔案館等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群團文件）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頁135-156。

<sup>27</sup> 關於五四時期四川新思潮的傳播，參見梁娟：《五四前後四川的文化氛圍與新文化的傳播——以華陽書報流通處、〈星期日〉及校園新文化為例》。

<sup>28</sup> 李劫人：〈本報的過去和將來〉，原載《星期日》第26期（1920年1月），收於《李劫人選集》第5卷（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頁1-5。

在成都，新讀物的據點是「華陽書報流通處」（原名「華洋書報流通處」），該流通處為青年們打開了一扇窗。<sup>29</sup>1915年，陳岳安（1889-1927）已經在成都銷售《新青年》，不過看《新青年》在那時多會被罵，其他人「雖不罵，卻是不看」。<sup>30</sup>流通處在1916年左右沒有引起青年群體的廣泛震動，<sup>31</sup>而五四以後，「新的書報給人爭先恐後地購買著」，<sup>32</sup>「學生也如饑似渴地讀新書，吸收新思想」。<sup>33</sup>各種新報刊「通過這個書店，及時地湧進四川，成為青年最喜愛的讀物」。被譽為「燈塔」的華陽書報流通處並不僅僅是一個賣書的場所，更是一個開放的文化空間。許多青年學生並無力購買大量書報，於是或如陽翰笙（1902-1993）一樣「在書報流通處呆上半年」，甚至「站在那裡當場讀」，<sup>34</sup>或如周尙明（1908-1928）等「用一種『分買共讀』的辦法儘量收購各種革命的和進步的書籍」。<sup>35</sup>流通處讀書也成為那時成都年輕人的共同記憶。譬如，通過流通處，巴金（1904-2005）和兄弟姐妹們購買了許多新書報，他們拿到書後不僅是「貪婪地」「爭著讀」，而且還每天晚上輪流讀書報並進行討論，家庭式的「研究會」開展了起來。據巴金說，他和兄妹讀到新刊物時「頭腦震動」，感覺

<sup>29</sup> 華陽書報流通處是傅樵村在成都所建的外省書報代銷點，一開始便由陳岳安主持。陳岳安，四川江安縣人，1908年就讀於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1912年跟隨傅樵村開始辦報，他主辦過《國民公報》，創辦了華陽書報流通處、《星期日週報》、《中洲評論》等，大量運進宣傳新文化的書報。

<sup>30</sup> 孫少荊、錢玄同：〈通信：羅馬字與新青年〉，《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年），頁89。

<sup>31</sup> 據吳虞說：1916年左右，《新青年》在成都的數量也不過幾十份。見吳虞：〈吳虞致胡適〉（1920年3月21日），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63。

<sup>32</sup> 巴金：〈信仰與活動——回憶錄之一〉，《水星》第2卷第2期（1935年），頁114-118。

<sup>33</sup> 陽翰笙：〈出川之前（下）〉，《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4期，頁25。

<sup>34</sup> 陽翰笙：〈出川之前（下）〉，頁28。

<sup>35</sup> 沙汀：〈記老共青團員周尙明同志〉，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23-124。

「那裡面的每個字都像火星一般地點燃了我們的熱情，那些新奇的議論和熱烈的文句帶著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壓倒了我們」。<sup>36</sup> 這一描述並不誇張。

在閱讀到新文化的書刊後，一些新青年也有了進一步的思考。朱近之就感覺要「有一個主義」，「單絲不成線，獨木不能成林」，「一個人單槍匹馬搞不出好大個氣候來，還得結合一批志同道合的一齊來幹，才搞得出一點明〔名〕堂」。更重要的是他還覺得單純地讀書無濟於事，「還得有一套理論，一個主義，作為行動的根據和基礎，似乎才有力量，也才有個目的」。<sup>37</sup>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那時四川新知識如「決堤」般湧入，學生們對於各種新奇的「主義」瞭解並不深入。他們廣泛接受各種「主義」，既不十分理解，但也全不排斥，或是將各種主義雜糅在一起，呈現出一種「複合體」式的樣態。<sup>38</sup>

五四時期四川新青年中流行的刊物《星期日週報》、《新空氣》、《威克烈》、《四川學生潮》等都「以轉輸新文化，改造舊社會自任」。這幾個刊物各自有其側重的方面：「《新空氣》主要針對鹽岸、工廠、市政等問題展開討論；《威克烈》更關注學術與教育問題」；<sup>39</sup>《四川學生潮》作為全省學聯的機關刊物，更多的是抨擊四川現狀與「舊」勢力，號召學生罷課、遊行，組織抵制仇貨等。<sup>40</sup> 以《威克烈》登載的文章為例，其中有的主張「永久和平」而打倒「野心家」、「軍閥」、「政府」，甚至反對「國」與「愛國」，也有的支援愛國並討論輿論問

<sup>36</sup> 巴金：〈信仰與活動——回憶錄之一〉，頁114-118。

<sup>37</sup> 朱近之：〈我的政治生活歷程〉，收於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五四運動在重慶》，頁326-328。

<sup>38</sup> 王汎森：〈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頁272-280。

<sup>39</sup> 張秀熟：〈五四運動在四川的回憶〉，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主編：《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頁137。

<sup>40</sup> 孟默：〈新文化運動在四川〉，《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3期，頁36-39。

題，還有的關切南北問題、財產問題與工人問題。<sup>41</sup>從目前可見的《星期日》雜誌目錄來看，雖然很早（如1919年第18號）就有人討論「什麼是主義」，<sup>42</sup>但文章的主題十分多元，改良習俗、<sup>43</sup>男女平等<sup>44</sup>等話題也受到關注。與全國其他地方相比，其時四川的這些刊物中未出現過多的「主義」宣導，而是側重於各種「新思潮」的普及。總的來看，刊物所載之文章多是批評「舊道德」、不平等、階級壓迫、禮教束縛等，並要求建立一個新世界。改革川政、反抗壓迫、拯救勞工、解放婦女等議題是當時刊物所關心的問題。這與五四時期「社會的研究和改造」的關切是一致的。

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各種主義確實也在逐漸獲得傳播，「寬泛的社會主義」是受到歡迎的。《星期日》雜誌上也不乏各種主義的相關報導。<sup>45</sup>「馬克思主義當時在成都已不是完全陌生，並已為少數進步知識份子所嚮往」，不過瞭解到它的人「都認識朦朧，絲毫沒有理論基礎」。<sup>46</sup>1919至1921年，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並不多。留學歸國的

<sup>41</sup> 〈威克烈報節選：永久和平〉，《興華》第17卷第20期（1920年），頁28；〈威克烈報選評：算不得真正代表輿論〉，《興華》第17卷第22期（1920年），頁29；〈威克烈報選評：新銀團可以監督用款嗎〉，《興華》第17卷第22期（1920年），頁29；〈威克烈報選評：產業的眞主人〉，《興華》第17卷第24期（1920年），頁30。

<sup>42</sup> 據目前存留之《星期日》雜誌目錄，可見該刊1919年11月9日之第18號內發表有辟武〈什麼叫主義〉一文。按《星期日》雜誌存於四川省圖書館，然筆者在該館查閱時，僅尋得目錄。據館員稱庫中此刊已不見蹤跡，恐因該館搬遷而遺失或誤放，目前僅能通過目錄識得該刊內容之大概。該目錄的查詢亦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年），頁773-778。

<sup>43</sup> 育才：〈改良舊家庭習慣的商榷〉，《星期日》第21號（1919年11月30日）。

<sup>44</sup> 靜穆：〈男女的不平等〉，《星期日》第23號（1919年12月14日）；盛紹堯：〈女子的革命運動〉，《星期日》第24號（1919年12月21日）。

<sup>45</sup> 孫少侯：〈俄國革命後的覺悟〉，《星期日》第19號（1919年11月23日）；不平：〈無政府的國民〉，《星期日》第21號（1919年11月30日）；今是：〈社會主義的勞動問題〉，《星期日》第22號（1919年12月7日）。

<sup>46</sup> 張秀熟：〈四川馬克思主義運動先驅者——記王右木烈士〉，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共產主義者王右木 1920 年底在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內開始組織「馬克思主義讀書會」，以傳播共產主義，當時亦有一批學生加入其中。爾後王右木在 1921 年創辦《人聲》，宣言稱該刊要「直接以馬克思的基本要義，解釋社會上一切問題」，<sup>47</sup>但其實從目前見到的《人聲》雜誌來看，早期的《人聲》雜誌中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學說的文章均有刊載，與其說它是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不如說它仍是「新思潮」或者廣義的「社會主義」的刊物。彼時的青年學生們也的確並不能很好地弄清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究竟有何區別。（說詳後文）到 1923 年，王右木給施存統（1899-1970）寫信時自己就說：

此地社會主義之趨向者為《半月刊》及《新四川十日刊》，右木為《新四川十日刊》社員之一。當時狀況，只以讀日本森戶辰男著《克魯泡特金研究》為主，及其他各新雜誌、社會主義派別，全不明瞭，此為前年正月事。<sup>48</sup>

王右木說的是 1921 年的事情，由此可見，五四以後兩三年的時間裡，四川新思潮中的真實情況是：新青年們已經感受到了各種主義，尤其是寬泛的社會主義，但他們對各種主義的派別沒有區分，共產主義雖然有了一定發展，然而仍較為遜色。而克魯泡特金學說也就是無政府主義學說影響最大。

如王右木所言，無政府主義在這一新思潮中征服了不少年輕學生，形成了一波浪潮。社會主義信仰者廖劃平就說，當時他在各種廣義的社會主義的派別中「最感興趣並受其影響的，主要還是巴枯甯和克魯泡特金等人宣揚的無政府主義」。<sup>49</sup>作家艾蕪（1904-1992）回

第 28 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25-30。

<sup>47</sup> 〈本社宣言〉，《人聲》創刊號（1922 年 2 月 7 日）。

<sup>48</sup> 王右木：〈給施存統的信（三）〉（1923 年夏），收於中央檔案館等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群團文件）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頁 108。

<sup>49</sup> 〈廖劃平〉，收於余子美主編：《內江市志》（成都：巴蜀書社，1987 年），頁 697。

憶，他的好友劉作賓(?-?) 當時最愛看的書，除了《莊子》和新思潮一類，還包括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劉作賓還把這本小冊子推薦給他看。<sup>50</sup> 巴金當時從華陽書報流通處得到了一本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品《告少年》，他看後覺得：

我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書！這裡面全是我想說而沒法說得清楚的話……。而且那種帶煽動性的筆調簡直要把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的心燒成灰了。我把這本小冊子放在床頭，每夜都拿出來，讀了流淚，流過淚又笑。那本書後面附印著一些警句，裡面有這樣的一句話：「天下第一樂事，無過於雪夜閉門讀禁書。」我覺得這是千真萬確的。從這時起，我才開始明白什麼是正義。這正義把我的愛和恨調和起來。<sup>51</sup>

從中可見，新奇的主義（特別還是「禁書」所載）給他們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主義宣傳的「正義」、「平等」等觀念藉由「煽動性的筆調」來傳導，這雖不至於使每個讀者像巴金一樣「讀了流淚，流過淚又笑」，卻容易使對現實不滿的年輕人激動起來。

「無政府主義」在成都的流行，與重慶適社的宣傳密切相關。據巴金回憶，他因閱讀艾瑪·高德曼(Emma Goldman, 1869-1940)的《實在自由錄》而獲得了無政府主義信仰，在悵然不知如何行動之時，巴金從一份刊物上見到了〈適社的旨趣和組織大綱〉，他覺得「那意見那組織正是我所朝夕夢想的」，「讀完了它，我的心跳得很厲害」。巴金半夜裡給《半月刊》的編輯寫信，希望能夠瞭解適社的更多內容，經過編輯的介紹，他結識了《半月刊》贊助者袁詩薏(1897-1928)、吳先憂(1901-1962)。

吳先憂在五四時期因犧牲精神而成名。他為了辦刊物常常典當衣

<sup>50</sup> 艾蕪：〈鼓勵者〉，《艾蕪全集》第13卷（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4年），頁32。

<sup>51</sup> 巴金：〈我的幼年〉，《中流》第1卷第1期（1936年），頁5-9。

服，甚至「為了使思想和行為一致起見，曾經拋棄了學業到一家裁縫鋪去做學徒，晚間弄得滿指頭都是針眼跑到社裡來服務」，<sup>52</sup>因此被人稱為「衛生徒弟」。其行為與人格受到不少人的敬仰。<sup>53</sup>他擅長紙上宣傳，如辦刊物、印傳單。1920年8月1日，吳先憂等在成都商業場成立「安那其同志會」，之後創辦了《半月刊》。（其實最開始，《半月刊》和當時的《四川學生潮》、《威克烈》一樣是傳播一般「新思潮」的刊物，並不是某一個主義的宣傳品）成都高師的袁詩薨在五四以前便已經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五四時成都學生遊行時袁是領頭者，此後他擔任四川全省學生聯合會副理事長，在成都新青年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袁極擅長「大講演、大號召、大宣傳」，<sup>54</sup>他因極強的演說能力成為四川學生運動的領袖。巴金覺得「他們充滿了熱情、信仰和犧牲的決心」，「他們給我友情，給我信任，給我勇氣。他們把我當作一個知己朋友」，便加入了他們。同時通過袁詩薨等人的連線，巴金也和重慶適社的負責人進行了通信。<sup>55</sup>

受到重慶適社的影響，當時吳等人已經準備效仿重慶在成都建立與適社類似的組織，吳先憂首先依託《半月刊》建立半月社，半月社很快成為了當時成都最有影響力的無政府主義社團。後《半月》同人袁詩薨等在辦刊之餘又發起均社，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教育普及，智慧均等」。<sup>56</sup>這一時期，成都與重慶的無政府主義者開始漸漸地緊密聯繫起來，藉由相似的信仰與追求，他們展開聯絡，時常通信。正是在這種新氣候中，四川的無政府主義組織逐漸結成。從第

<sup>52</sup> 巴金：〈小小的經驗〉，《文學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頁1077-1081。

<sup>53</sup> 艾蕪：〈鼓勵者〉，《艾蕪全集》第13卷，頁32。

<sup>54</sup> 張秀熟：〈袁詩薨序〉，收於氏著：《二聲集》（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頁485-491。

<sup>55</sup> 《半月刊》發起時，巴金並不是成員之一。他是在中途加入，且並未像袁詩薨、吳先憂等人一樣承擔主要工作。後來的很多研究將巴金作為半月社的贊助者，並不準確。

<sup>56</sup> 〈本社宣言〉，《半月刊》第11期（1921年）。

11 期起，《半月刊》完全成為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刊物，其宗旨是提倡「無政府主義」，行動是「反政府、反家庭、反一切封建勢力」，具體實踐則是倡議男女同校及女子剪髮。《半月刊》的轉型也提示了四川從「新思潮」走向「主義時代」的轉變。

《半月刊》同人還另設了無政府主義書報流通處，將《告少年》、《極樂地》、《味爽軒一夕談》等小冊子向社會大眾傳播。同時，吳先憂主張要消除國家與政府，得從語言文字做起，便依託雜誌社開辦了世界語講習班。<sup>57</sup> 不過，《半月刊》並未維持多久，即因女子剪髮問題刊登了駁斥成都警廳的文章而被查封。<sup>58</sup> 其他社團如悟社、直覺社等成立時間不長，人員流動較大，並未形成如半月社一樣的影響。如劉先亮(?-?)、王怡庵(?-?) 等人組成的「直覺社」，刊物《直覺》出版了兩期之後便因社員外出讀書等原因停刊了。<sup>59</sup> 半月社之所以形成如此大的影響，離不開袁詩薨、吳先憂等人在學生中的號召力，一眾受新文化影響的青年學生便很容易受到鼓動，而其他的社團因為缺少這樣的堅強人物，很快便零落四散。

### 三、織網成群：

#### 盧劍波與川東地區的無政府主義傳播

除了重慶和成都外，五四以後四川其他地區的無政府主義發展也有聲有色，其中發展最好的地區當屬川東各地。本文開頭提到的盧劍

---

<sup>57</sup> 舒君實：〈五四運動時期成都的進步刊物《半月刊》〉，收於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辦公室編：《五四運動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頁346-348。

<sup>58</sup> 陳竹影：〈回憶五四運動在成都的二三事〉，收於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集粹》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間不詳），頁503。

<sup>59</sup> 陳竹影：〈回憶五四運動在成都的二三事〉，收於《四川文史資料集粹》第1卷，頁503。

波，其家鄉合江就位於川東地區。像合江這一沿江的城市「由於江河航運的有利條件」，「頻繁來往的客商和其他過路行人，傳遞著縣外、省外，乃至國外的消息，包括商業行情，政治局勢，革命動向和革命理論」。因此「合江這個山區縣，並不閉塞」，「各種思潮和報刊也很容易傳入合江」。<sup>60</sup> 本節我們不妨以盧劍波為案例，觀察「主義」如何在地方的小城市流傳。

盧劍波出生在合江的一個較為「新派」的家庭。其伯父盧仙舫（?-?）是辛亥鼎革後合江的首位議長，後死於「護國軍」之手。盧劍波的父親盧汝清（1872-1934）也是首屆四川臨時省議會議員，<sup>61</sup> 除此之外，盧汝清在辛亥以後不久還加入了江亢虎組織的「中國社會黨」。<sup>62</sup> 中國社會黨是江亢虎以中國傳統之大同理想結合社會主義而成立的政治組織，<sup>63</sup> 雖然並非無政府主義，卻頗有些無政府色彩。或許是有了這一背景，父親對他的思想動態一直抱持「同情」與理解。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的盧劍波，有意無意地受到無政府主義的薰陶。<sup>64</sup>

五四時期，盧劍波不過十四五歲，然而作為中學生的他也捲入了這一運動。盧氏當時在合江中學發起學生聯合會，藉用其伯父之子盧思能的茶館設立校外辦事處，還在城隍廟內廣場開會講演。<sup>65</sup> 盧劍波

<sup>60</sup> 王騰波：〈我追求之路〉，收於《合江縣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合江：政協合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年），頁120-121。

<sup>61</sup> 〈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七年四川省歷屆省議會組成人員名單〉，收於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四川軍閥史料》第2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523。

<sup>62</sup> 蔣俊：〈盧劍波先生早年的無政府主義宣傳活動紀實〉，收於《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頁1009。

<sup>63</sup> 曾業英：〈民元前後的江亢虎和中國社會黨〉，《歷史研究》1980年第6期，頁45-47。

<sup>64</sup> 盧廷義：〈我們的父親〉，收於盧箏、盧劍予編：《我們的父母親》（家庭內部印刷本），盧萬儀先生家藏，頁18。

<sup>65</sup> 盧劍波：〈在合江中學領導罷課抗議軍閥侮辱學生的鬥爭實錄〉，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合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等編：《合江縣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頁76。

那時也與重慶聯中學生組織的渝江評論社有了聯繫，還以「劍波」的筆名給該社的《渝江評論》投稿。<sup>66</sup>

1920年，合江也如重慶一樣被楊森控制，北大畢業的鄒繼魯（?-?）執掌合江中學，新聘來了青年教師李宗泌（?-?）。盧劍波等「對新來的年青老師，既好奇又感到有趣」，一天上午下課後，盧劍波走過李宗泌老師的房門，從窗子望進去，看見了有好多本薄薄的書擺著，便蹣跚起腳伸手去拿出來看，由此接觸到了一批無政府主義的書刊。<sup>67</sup>次日，盧劍波並未將書刊還給李宗泌，老師也不見怪。盧劍波自此以後與李宗泌來往密切，從李宗泌那裡，盧劍波了解到蘇聯的社會主義「消滅了階級貧富，男女平等，廢除了金錢，人人只要勞動就有衣食住，不勞動不得食，人人都可以受到教育，直到大學，不分國別民族」，因此對於社會主義心生嚮往。書及於此，本文開頭的故事便完整了，盧劍波的無政府主義知識的來源顯現出了一個清晰的「達州——重慶——合江」的傳導網路。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時的李宗泌和盧劍波都不將蘇聯的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作嚴格區分，而是基本混為一談，單純地嚮往共產、平等、自由等。

在獲得了「主義」以後，盧劍波從知識的接受者變為了知識的傳播者。當他得知蘇聯已經實現社會主義後，心馳神往，欲親身赴蘇聯考察。經過李宗泌的指引，他在1921年來到重慶，準備去蘇聯。在重慶，他兩次見到陳小我，從陳那裡得知蘇聯已不能去，盧劍波便在重慶聯中住下，參加了川東學生聯合會組織的學生遊行、燒毀日貨等活動。在這個過程中，許多重慶的本土學生刊物如《友聲》、《渝江評論》等都開辦起來，盧劍波便和老鄉龍爾升（?-?）發起了《合江潮》。之後學運風波漸息，他在父母的催促之下回到了合江。

回到合江，盧劍波在合江中學大力宣傳無政府主義，並成為學聯

<sup>66</sup> 盧劍波：《回憶瑣記》，頁7。

<sup>67</sup> 同前註。

的負責人。1921年8月，他在合江中學組織「覺社」。一個月後，盧劍波發起抗議九師駐合部隊士兵侮辱學生的罷課行動，要求懲辦不法士兵。<sup>68</sup>他自己說這是因為「他在重慶有了一些在群眾中活動的經驗」。行動失敗後，盧劍波和其他兩名主事者被逮捕，不過另兩人只是投卡（進看守所），惟有盧被捕入獄。獄中的犯人們「差不多都是衣褲破爛補丁，蓬首垢面的人」，他第一次感到害怕。但是，由於獄中有熟悉其父親的哥老會成員的關照，加之他常給各色犯人唸家信，因而盧劍波與犯人們相處良好，也在獄中獲得了一定的自由。兩個月後他才被父親託關係由縣教育會保釋出獄。

十七歲的這一段獄中經歷對盧劍波影響極大，以至於在五十多年後寫作回憶錄時他還能清晰地記得監牢裡的陳設、獄中的會話。他說：「這是我終身不忘的一次經驗，甚過學者到監獄裡視察調查所得的見聞，也等於讀了一本『法律與強權』的書」。<sup>69</sup>他後來自己常常感歎「苦厄是難免的」，卻也因這一段不尋常的經歷，堅定了以無政府主義改造社會的決心。<sup>70</sup>

出獄以後，盧劍波已被開除了學籍。但他仍然沒有停止無政府主義宣傳活動，因此再次被告發。在父親的安排下，盧劍波轉而到重慶中學做了插班生。也正因此，他又回到了川東無政府主義活動的中心。在此期間他與陳小我等人過從甚密，每週都與陳小我見面，聽他講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和各派社會主義的異同。<sup>71</sup>通過陳小我，盧劍波認識了袁詩薨、吳先憂等成都的無政府主義同志。盧劍波早在接受無政府主義以前便與巴金因學習世界語有過通信，此後因為相同的信

<sup>68</sup> 合江縣誌編纂委員會：《合江縣誌》（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頁17。

<sup>69</sup> 盧劍波：〈在合江中學領導罷課抗議軍閥侮辱學生的鬥爭實錄〉，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合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等編：《合江縣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頁78-81。

<sup>70</sup> 劍波：〈生的「門檻」〉，《宇宙風》第130期（1943年），頁210-211。

<sup>71</sup> 蔣俊：〈盧劍波先生早年的無政府主義宣傳活動紀實〉，收於葛懋春、蔣俊等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頁1013。

仰，他們更加熟悉起來。<sup>72</sup>

次年，盧劍波轉學至瀘縣川南師範。民國十一年（1922）春初，盧氏攜許多小冊子如《告少年》、《安那其集》步行至瀘縣，轉學川南師範三年級。<sup>73</sup> 他受陳小我的委託，在瀘州傳播安其那主義，途經合江時還以「合江覺社」的名義進行宣傳，引發轟動。川南師範的學弟張履謙（1903-1958）<sup>74</sup> 受到他的鼓勵而成為無政府主義者。毛一波後來說，盧劍波和張履謙「背了許多《告少年》之類的宣傳品步行到瀘，走了好幾百里，一點不覺得為誰辛苦為誰忙。那曾使我感動，願意和他們在一起」。這種傳遞主義而百里跋涉不知辛勞的心情，我們已經很難體會，不過彼時確實影響了很多人。當時恽代英（1895-1931）正在川南師範，盧劍波同樣與其相處融洽。不久，盧劍波跟同班同學鍾心見（?-?）、周先治（?-?）相熟，盧劍波「給他們小冊子」，他們幾乎天天課餘都在茶館裡討論和商量如何進行工作，「五個人成立了一個小組，先把帶來的小冊子，送給瀘縣圖書館，並徵求預定《克魯泡特金思想》，同時也計劃出刊。<sup>75</sup> 同學薛冥（?-?）、李之青（?-?）也受其感召組織了「愛波社」，<sup>76</sup> 他們依託愛波社辦了週刊《零星》，因為經費關係，由張履謙向《重慶商務日報》編輯龔一維（?-?）接洽，最後得以附在該報上發表。<sup>77</sup>

「主義」的流動與傳播有賴於這些主義者身體力行的宣導，或以

<sup>72</sup> 喻亨仁：〈盧劍波傳〉，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合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等編：《合江縣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合江：政協合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2年），頁33。

<sup>73</sup> 一波（毛一波）：〈三十年代的川籍作家十：盧劍波〉，四川文獻研究社：《四川文獻》（臺北）第55期（1967年），頁17。

<sup>74</sup> 喻亨仁：〈盧劍波傳〉，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合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等編：《合江縣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頁35-36。

<sup>75</sup> 盧劍波：《回憶瑣記》，頁7。

<sup>76</sup> 毛一波：〈難忘的回憶〉，收於丹晨編：《巴金評說七十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6年），頁25。

<sup>77</sup> 毛一波：〈川南師校雜憶〉，四川文獻研究社：《四川文獻》（臺北）第124期（1972年），頁19-20。



其行為感人，或以其宣傳動人。在地方，向大眾傳播主義並不像在大城市中一樣容易，針對新情況，他們並沒有使用傳統的印雜誌等方式——對於缺少文化與知識的大眾來說，那些文章太深奧了。盧劍波、陳小我等所採用的方式都是宣傳單加小冊子的方法，他們刊行《歎五更》、通俗冊子《一個兵的說話》、《兩個工人的談話》等通俗易懂、有煽動性的讀物，以手提包攜帶，將其散發至同學間、圖書館，甚至還編纂順口溜、歌謠等等。如盧劍波後來回憶，在重慶時，陳小我就曾寫過〈勞動歌〉，其中有「夏傳子，家天下，不良景象；福斯的美山河，一家獨藏，逼人民上糧稅，名號皇餉，借衛國招勇兵，如同虎狼，□□□，兵權獨掌欺侮得，百姓們叫哭叫天」等通俗曉暢、明白易懂的句子。<sup>78</sup> 這些方式「都很生了一些效果」。<sup>79</sup> 後來合江的共產黨人王騰波（1920 或 1921-1998）亦曾回憶說：

同學盧貞、盧廷碧的哥哥盧劍波從外面經常給她們帶回一些傳單似的資料。我們便一起在月光下閱讀……我看的那些宣傳資料內容都是鼓勵人們不怕刀，不怕槍，不怕流血犧牲，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社會，為後代謀幸福。從這些書刊和傳單中受到鼓舞，也初步認識到社會的不平，貧富的懸殊是由於有反動統治，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sup>80</sup>

可見盧劍波早期的宣傳在青年中確實起到了效果。這一時期在地方傳播主義的經歷，對於後來盧劍波思考無政府主義的走向也起到了作用。

另一個方法是抱團取暖。當時不僅是無政府主義者之間形成了網路，無政府主義與共產黨人也互相支援，陳小我和袁詩蕘發起宣言主張無政府主義與共產黨合作，陳還寫信請惲代英幫已經輟學

<sup>78</sup> 盧劍波：《回憶瑣記》，頁10。

<sup>79</sup> 劍波（盧劍波）：〈怎樣去宣傳主義〉，《國風日報·學匯》（北京）第194期（1923年），頁3-4。

<sup>80</sup> 王騰波：〈我追求之路〉，收於《合江縣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合江：政協合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年），頁120-121。

的盧劍波在瀘縣謀事。<sup>81</sup> 盧劍波也和瀘縣的共產主義者李元傑等人合作開展活動。<sup>82</sup> 借用王奇生的話來說，這時候的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難分彼此。<sup>83</sup>

像盧劍波、張履謙一樣「不覺得為誰辛苦為誰忙」，是那時的傳播者們共同的寫照。巴金說：「我覺得那個時候我是沒有矛盾的。我或者在大街上散傳單，或者在商場樓上跟朋友們一道抬雜誌社的鋪板，或者做別的事情，那些日子裡我覺得十分快活。我只有一個希望：謙遜地犧牲自己，不要人知道我的姓名，知道我的一切。我的心中只有對朋友們的友情和對人類的空泛的愛。一本小冊子就是我們的福音，一句話就可以叫我們犧牲性命」。<sup>84</sup> 正是在這種犧牲精神之下，結社、交流、傳播等得以順利展開，信仰一致的人相遇合，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空間網路」。<sup>85</sup> 主義的認同可以構成知識人不同的共同體，在四川，這些無政府主義共同體（如適社、均社等）互相聯結，便編織成四川無政府主義之網。

#### 四、思想的「在地」實態： 五四時期四川無政府主義者的主義認知

當已經將無政府主義在四川的流布細細講來以後，我們還需要考察的是相對於共產主義等其他思潮，無政府主義何以在四川獲得如此

---

<sup>81</sup> 唐敦教、陳國衡：〈陳慕勤傳〉，收於中共瀘縣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鳳麓忠魂 瀘縣市革命英烈傳》，頁109-118。

<sup>82</sup> 李元傑：〈惲代英在瀘州建立的第一個「S·Y」支部〉，收於政協瀘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瀘州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瀘州：政協瀘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1983年），頁111。

<sup>83</sup> 王奇生：〈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頁99。

<sup>84</sup> 巴金：〈片段的記錄〉，《大公報》（天津）第12版，1936年4月1日。

<sup>85</sup> 許紀霖：《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總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0。

廣大的影響。

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無政府主義的傳入較之共產主義要更早。前已述及，至1920年底，王右木才在成都高師內設立了四川省內第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組織「馬克思主義讀書會」，而川南地區著名的共產主義先驅惲代英在1922年5月5日才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2年左右，有了中共中央的直接指揮，加之一批無政府主義的領導者離開四川後，馬克思主義才迎來其在四川發展的黃金時期，並後來居上，發展勢頭超越無政府主義。<sup>86</sup> 而如前文所述，五四時期，一批無政府主義社團早已在重慶、成都等地生根、發展，其他思潮的發展空間並不很大。除此之外，如前揭盛明研究中所提示的，這也可能與四川在民初戰亂頻仍的社會現實相關。

其次，我們似乎還需要對於這一時期四川青年們心中的「無政府主義」做一些分疏。換句話說，「五四」時期四川流行的「無政府主義」，或許和真正的無政府主義存在差別。那時的情況可能比較接近胡適所說的「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用同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sup>87</sup>

盧劍波的父親在和他的談話中也曾說：「你們那個無政府主義，我都贊成。儒家說的大同之世也就是那麼一回事。」<sup>88</sup> 不僅老輩的人這樣想，五四時在成都高師讀書的青年杜鋼百（1903-1983）也說，「當時我家的叔伯都崇敬井研廖季平先生，我常聽傳達廖先生講《禮運》篇大同小康學說，又講春秋《公羊》『張三世』、『通三統』諸義」，因此他當時就認為「我們中國和西洋都有社會主義」。<sup>89</sup> 時人常

<sup>86</sup> 關於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競爭關係，劉宗靈已有研究，參見劉宗靈：〈從「並行不悖」到「百川歸海」——四川地區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聚會之途及群體特徵分析〉，《蘭州學刊》2018年第4期，頁16-28。

<sup>87</sup>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期第1版（1919年）。

<sup>88</sup> 盧廷義：〈我們的父親〉，頁18。

<sup>89</sup> 杜鋼百：〈回憶王右木烈士〉，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成都：四川人民出

常援引古代學說來比附、理解無政府主義，在曲解了無政府主義的同時，卻也令無政府主義在社會上的流行更為容易。

除了傳統思想的延續外，那時還有一種「提倡某些一般的社會主義理想而不作細微的思想體系區分的傾向」。<sup>90</sup>這一時期受到歡迎的「社會主義」，是「各種各樣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前提並不一致的社會主義」。當時突出的是對於「社會革命」的要求，此時的新青年們對於社會改造已有了憧憬，但是對於實現手段的認知，還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sup>91</sup>這呈現出來的，正是「主義時代」初至時的狀態。

在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習的葉道信（1898-?）後來回憶說，「學生會中有半數代表加入馬克思讀書會，亦有加入社會主義學會，我亦想加入。……袁詩堯告知我，加入這邊，就不能加入那邊。當時我認為都是一樣（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隨後才知道完全不同，這是1920年暑假期中事了」。<sup>92</sup>應該說，與葉道信有著類似想法的學生並不在少數，在重慶讀書的朱近之也說：「我們那時沒有經驗，缺乏批判的能力，只要你不滿現實，敢於衝破羅網便覺得你好，至於馬克思主義的面目究竟如何，與安那其主義有那些區別，簡直是一竅不通，因為完全沒有接觸過，便完全接受，便向同學們大作宣傳。」<sup>93</sup>舒君實當時雖是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但他們編刊物時，「想把『無政府主義』這一詞改為『無治主義』，理由是只說無政府是狹隘的，不能包括全義，無治者，旨在不但不要政府也不要國家，人

---

版社，1983年），頁47。

<sup>90</sup> 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05。

<sup>91</sup>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88。

<sup>92</sup> 〈葉道信1950年的回憶〉，收於中共江油縣委黨史辦公室編：《四川馬克思主義運動先驅者——紀念王右木誕生一百周年》（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261。

<sup>93</sup> 朱近之：〈我的政治生活歷程〉，收於《五四運動在重慶》，頁326-328。

人自治，反對人治、法治，認為這樣社會就會安全了」。<sup>94</sup>可見他們並不完全理解無政府主義學說。年輕的學生們並不太懂得各種「主義」的區別，然而都有想了解的欲望，或是出於對「舊」的叛逆而從「新」。<sup>95</sup>

上面這些回憶或許受到1949年以後回憶、寫作當時意識形態的影響（「無政府主義」在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官方語境中已經負面化），但當時身在湖南的青年毛澤東（1893-1976）也同樣感到「現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瞭的概念」，<sup>96</sup>說明這並不是四川特有的現象。巴金在1930年代的回憶也證明了這一點：

從《告少年》裡我得到了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個小孩子的幻夢，相信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一切的罪惡都會馬上消滅。在《夜未央》裡，我看見了在另一個國度裡一代青年為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鬥爭之大悲劇，我一次找到了我的夢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終身事業，而這事業又是與我在僕人轎夫身上發見的原始的正義的信仰相合的。<sup>97</sup>

巴金回憶這一段往事時已是1935年，彼時他已不在歷史現場，少了一點「身在此山」的遮蔽，同時又去五四不遠，這一分觀察應該可以

---

<sup>94</sup> 舒君實：〈五四運動時期成都的進步刊物《半月刊》〉，收於《五四運動親歷記》，頁346-348。

<sup>95</sup> 1921年從綦江來到重慶的危石頑說：「那時自己思想認識還是模模糊糊的，但總覺得是應該幹的」，「見到北京教授吳虞（四川人）打孔家店，我們也打『孔家店』」。見危石頑：〈我參加革命活動的回憶〉，收於《中共綦江縣黨史資料匯編》第1輯（綦江：中共綦江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1986年），頁140。

<sup>96</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頁474。

<sup>97</sup> 巴金：〈信仰與活動——回憶錄之一〉，《水星》第2卷第2期（1935年），頁114-118。

讓我們看到當時的閱讀狀況。1935年時巴金雖仍是無政府主義者，但他坦誠地說五四時期對無政府主義知識的閱讀體驗，更像是「小孩子的幻夢」。1949年以後旅居臺灣的毛一波沒有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背景，但他也說：

至於有理論、有行動的師復，直接影響不大。《民聲》一刊也流傳不廣。想來這與當時的交通不夠方便也有關係。當時在四川最為人歡喜的學理書，是凌霜編譯的《克氏思想》，由北京實社出版。<sup>98</sup>

毛一波提到的黃凌霜後來就參加了中共北京小組，在他那裡，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完全對立的，即使這兩個主義派別的原旨顯然不同。阪井洋史認為這顯示出五四時期「社會主義」「未分化之狀態」的實質，對於這一論斷，筆者表示贊同。

1922年春，在離開四川奔赴南京求學之際，盧劍波在《蜀聲雜誌》上發表了〈新思潮之研究〉一文。從這一篇文章，我們可以大概窺見他當時的思想狀態以及對於社會主義的認知：

社會主義，派別紛繁，或背道相馳，或殊途同歸，其主要學說為「無政府、無家庭、無宗教、各取所需、各盡所能」。年來吾國青年，驚其新奇，力事鼓吹，果能盡如理想，則束縛悉弛，平等實現，豈非自由之極軌、幸福之沸點耶。<sup>99</sup>

可見，遲至1922年初，盧劍波還認為「無政府」是所有社會主義學說之主要特點。雖然先前他已從陳小我那裡了解到社會主義的各派異同，但從這裡看來，他的了解並不充分。與其說那時他是一個「無政

---

<sup>98</sup> 毛一波：〈毛一波致阪井洋史信〉（1981年11月5日），阪井的提問為：「五四時期，在四川，師復的影響力怎麼樣？」。轉引自阪井洋史：《巴金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41。

<sup>99</sup> 廷傑：〈新思潮之研究〉，《蜀聲雜誌》第2期（1922年），頁4。

府主義者」，倒不如說是一個嚮往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者，他並沒有捋清各種社會主義的派別差異，只是隱隱地嚮往著「無政府、無家庭、無宗教」。

胡適很早便注意到當時的人「高談主義是容易的事」，「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sup>100</sup> 對照前文所述，可以看到胡適的見解確實道出了實情。直到1921年，雖然「主義」越來越成為風尚，但是人們的理解仍處於較為淺薄的階段。<sup>101</sup> 這種接觸到了「主義」，卻領悟的朦朦朧朧，並不真切的狀態，恐怕是當時的一種普遍情況。

不過，對於久感苦悶與落後的四川新青年來說，新鮮的主義所反對的，恰恰是他們所反對的；主義所要破壞的，正是他們所不滿的，主義所關懷的問題，都是他們有切身感受的問題。刻下他們所考慮的便是要打破舊的東西，至於主義的內涵為何，怎樣具體地實現主義，主義實現以後的真正後果，則並未被他們詳加考量。

因此，無政府主義之所以能夠在這時盛行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它並不非常忠實於無政府主義的「原教旨」。當時的四川無政府主義者所認同的價值觀和行動包括：反對軍閥統治，捍衛勞工權益，主張人人互助，要求男女平等，實現社會的自由等。這些訴求實際上與「新思潮」的總體期待吻合，且差別不大。

1920年1月4日《星期日》雜誌刊登了《青年組織團體的好模範》一文，其中說，國內青年團體如北京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等「是未來的新中國的曙光」。但是最值得四川青年效仿借鑒的卻是「無名

---

<sup>100</sup>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期第1版（1919年）。

<sup>101</sup> 就是在少年中國學會中，「真正對一種主義有深厚的研究，與明確的判斷，信仰終身而一成不變的人，還不多見」，「偶有一二其人，而各人信仰，也極不一致」，人們「多數並無主義的信仰，就是少數有主義的人，也不過一種好奇心的衝動，並無特別深厚的研究與堅確的信仰」。張夢九：〈主義問題與活動問題〉，《少年中國》第3卷第8期（1922年），頁58。

稱、無章程」的「浙江新潮社」。《星期日》編輯部認為，他們這種沒有首領、沒有組織、沒有領導的模式正是「最新出、最純潔、最篤實、最可寶貴、最有希望的團體組織的辦法」。<sup>102</sup> 從中可見，有領袖、有章程的團體，並不符合《星期日》同人的期待。他們所希望的是打破一切，同時達到絕對平等、絕對自由的狀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無政府」學說得以在四川生長的土壤。

此外，無論是啟迪陳慕勤的《極樂地》等小說，還是無政府主義學說，之所以能引起青年共鳴，還在於它們將想像的「未來世界」設定在現實的歷史進程之中。《極樂地》的翻印者說該書「無一句不是虛空粉碎、打通後壁、合乎真理、順乎人心、赤裸裸、光明明的痛快文字」，<sup>103</sup> 其中所刻畫的苦難人間本於民初的世態，其開始、結局均是現實中事。虛幻世界與現實世界相交，困窘的現實與夢幻的未來對比，使得「未來」具有了激動人心的力量。而《告少年》更是以訴說的口吻將血淋淋的現實鋪開在少年的眼前，指引他們「預備那社會大革命」：革命成功以後，一切舊的東西都將被破壞，「開了許多新天地，在人類社會裡，終於實現了那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無政府主義學說和傳統的大同世界觀念不同的是，它不僅僅指出一個烏托邦的未來，而且帶有「行動主義者的革命思想」，<sup>104</sup> 由此開啟了一種想像未來並走向行動的可能。

同時，四川與外省存在著一種「時間差」，<sup>105</sup> 由於地理、交通的限

---

<sup>102</sup> 〈青年組織團體的好模範〉，原載《星期日·社會問題號》第26期（1920年1月4日），引自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五四運動在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625-626。

<sup>103</sup> 初明：〈翻印《極樂地》序〉，轉引自蔣俊：《略論〈極樂地〉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意義》，《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頁96。

<sup>104</sup>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頁105。

<sup>105</sup> 王東傑：〈「不異的異鄉」：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認知中的全國與四川〉，《國中的「異鄉」：近代四川的文化、社會與地方認同》（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22-127。



制以及「舊」的力量強大，四川在近代一直較為封閉、保守，在「五四」以前與外界的各種新潮流有著相當距離。如前引葉道信所說的，當時大家對紛繁的主義「認為都是一樣」，都想參加，可見所有的「主義」在那時的四川居於一種平等的位置。五四以後在外界已經十分流行的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在四川可能就沒有那麼流行。川內川外思想的時間差，導致了因果易位。即使是在五四以後，四川整體相對川外各省仍偏「舊」。<sup>106</sup> 因此在川外已經是「舊思潮」的無政府主義，對於五四以後的四川來說，卻還是「新」的。眾所周知，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黃金時代是清季民初，1920年代無政府主義已經逐漸退潮。然而正是在中國無政府主義沒落之際，來自四川的盧劍波、張履謙等人卻成為了無政府主義運動中極其重要的角色。狹間直樹認為，無政府主義中所帶有的理想化和過激化的傾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展開的「前提」，<sup>107</sup> 但在四川，無政府主義的流行，卻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結果」。這已經可以回答為什麼在全國性的無政府主義走向沒落之時，四川反而會產生如此之多的無政府主義信徒。在這一故事上演的，正是一個有時差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在帝制業已消亡、民國在短時間內並未帶來多少改變的情況下，政體變易無濟於事的印象在社會中浮動，新傳入的「無政府主義」主張打碎一切政府，建立平等的世界主張最顯出徹底。由此，如達恩頓（Robert Darnton）在《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一書中所寫的摩

<sup>106</sup> 當時四川還有「五老七賢」這樣的群體存在，（參見許麗梅：《民國時期四川「五老七賢」述略》（成都：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各學校的情況也以「舊」的一面為主，見吳虞：〈吳虞致胡適〉（1920年3月21日），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頁63。在1920年，吳虞便已經感到「文化運動，在外省聲氣頗廣，常及數省，冒險猛進，多得後援，而在成都，即成死地，孤掌難鳴，易蹈危難」。見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吳虞日記（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558。

<sup>107</sup> 參見狹間直樹：〈五四運動的精神背景——對憚代英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歷史評價〉，《廣東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頁70-78。

西厄的文字那樣，這些來自安那其主義的想像「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幻象世界」，在閱讀中，作家和讀者讓虛幻的夢想成真，而從閱讀到行動，「生活最終是一部打開的書」。<sup>108</sup>

## 餘 論

一本清季民初的幻想小說《極樂地》點燃了達縣青年陳小我的無政府主義熱情，從此他在川東地區進行主義的傳播與宣導。「五四」以後，不論是重慶、成都等中心城市還是小城合江，都沐浴著新空氣。藉由「五四」的契機，陳小我在重慶辦適社、印書刊，造成無政府主義的風潮。成都的一批青年受重慶適社等的小冊子的影響，也成為無政府主義的信徒。除了重慶、成都這樣的大城市外，小城合江的少年盧劍波也接觸到來自重慶適社的小冊子，由此成為了無政府主義者。即使屢遇險境，他仍熱衷於傳播自己篤信的主義。通過閱讀，無政府主義來到了這些四川青年的生活之中，而閱讀者們又成為了小冊子新的傳播者，循環往復中，思潮就此形成。

不過我們也需要注意到，身處新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網路中的新青年們，即使是那些熱情洋溢的宣傳者，對於主義也未必認識深刻，研究充分。事實上，每個人對於新知識的選取、理解、接受千差萬別，<sup>109</sup>總體上也呈現出一種朦朧的狀態。但這種趨新的熱情卻促使他們去為「新思想」、為朦朧的「主義」付出行動。

對於四川的這群年輕人而言，「五四」、「新文化」的作用並不是在彼時彼刻就立即製造了無數真正的主義信徒。重要的是，它開啟了一個契機——不論信仰與否，接受程度如何，主義來到了他們的生

---

<sup>108</sup> 羅伯特·達恩頓 (Robert Darnton) 著，鄭國強譯：《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頁 141。

<sup>109</sup> 張仲民所舉舒新城的例子情況亦類似。見張仲民：〈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在地化〉，《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頁 310、311、315。

活。此後他們會不斷地認識、再認識這些學說：有的人改變了原來的信仰，有的人加入了主義的世界，有的人則只是單純地學習著新知識。這種契機帶來的不僅是思想的動力，也是實踐的動力。雖然在四川，新青年們沒有在當時占據優勢，但新的思想就如同新的血液，在軀體之外難以察覺，卻為後來的時代走向留下了無數伏筆。

五四以後的許多四川籍共產主義者，原來都曾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sup>110</sup> 或可以說無政府主義給他們帶來了較早的關於「社會主義」的啟蒙。而如果我們再把目光投向四川之外的全國，則會發現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國無政府主義的中堅力量，許多都是五四前後加入無政府主義者行列的四川青年。

更進一步，據1920年在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張景（?-?）回憶，當時有一位來自四川的青年羅豁（?-?）給他們帶來了一些小冊子，這些冊子包括《克魯泡特金思想文集》、《共產黨宣言》、《互助論》、《麵包略取》、《夜未央》等，「大家熱情地閱讀，興奮地討論，特別是讀克氏的《告青年》一文和《夜未央》劇本，受了不小的激發，都決心要參加改造舊社會建造理想的新社會運動」。隨後，這群遠在東洋的年輕人便組織團體，開展活動。<sup>111</sup> 由此可見，小冊子影響下的四川青年，又將他們獲得的小冊子及「主義」，傳播到了川外乃至國外。

從本文的論述，我們或許也可以重新思考「地方」之於中國近現代史的意義。首先，「地方」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它是「整體」的一部分，只有將這些「部分」的線索摸索清楚，整體的歷史圖景才會更加完整地浮現。其次，「地方」的重要性，也在於其與「整體」的相異性，也就是它具有的獨特性。正如本文所揭示的，四川的新青年

<sup>110</sup> 劉宗靈：〈從「並行不悖」到「百川歸海」——四川地區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聚合之途及群體特徵分析〉，《蘭州學刊》2018年第4期，頁16-28。

<sup>111</sup> 張景：〈安那其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活動片段〉，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90-92輯第31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頁79。

們所理解的「無政府主義」，可能並不成熟，而是混雜著地方思想、傳統觀念的集合體，並且川內川外的思想文化還有明顯的時間差，因此，它與全國其他地區的無政府主義也就有了區分。再次，「地方」的意義還在於它與其他「地方」及「全局」的聯繫，以四川的「五四」為例，這不僅是一個地方史的命題，更是「五四」整體敘事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能夠看到知識與思想在不同區域中的旅行及其在更大時空維度內的展開，特別是注意到其中知識在地方的實態，那麼我們對於全景的「五四」，也將有更豐富的體認。如是，我們不僅能從地方研究中為中國近現代史的整體圖畫塗抹色彩，也能發掘歷史中地方的獨特風景，更能「從地方反觀中心」，<sup>112</sup>突破我們的許多既有認知。

（責任校對：唐雨薇）

---

<sup>112</sup> 瞿駿：〈勾畫在「地方」的五四運動〉，《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11期，頁109-119。

## 徵引書目

- 〈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七年四川省歷屆省議會組成人員名單〉，收於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四川軍閥史料》第2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521-533。
- 〈川東學聯參加裁兵促進會宣言〉，收於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五四運動在重慶》，頁264。
- 〈本社宣言〉，《人聲》創刊號，1922年2月7日，頁1。
- 〈青年組織團體的好模範〉，收於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五四運動在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年。
- 〈威克烈報節選：永久和平〉，《興華》第17卷第20期，1920年，頁28。
- 〈威克烈報選評：產業的眞主人〉，《興華》第17卷第24期，1920年，頁30。
- 〈威克烈報選評：新銀團可以監督用款嗎〉，《興華》第17卷第22期，1920年，頁29。
- 〈威克烈報選評：算不得眞正代表輿論〉，《興華》第17卷第22期，1920年，頁29。
- 〈葉道信1950年的回憶〉，收於中共江油縣委黨史辦公室編：《四川馬克思主義運動先驅者——紀念王右木誕生一百周年》，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261。
- 〈廖劃平〉，收於余子美主編：《內江市志》，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
- 〈適社的意趣和大綱〉，收於葛懋春、蔣俊等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527-530。
-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資料（修訂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 一波（毛一波）：〈三十年代的川籍作家十：盧劍波〉，《四川文獻》

- (臺北)第55期,1967年,頁17-18。
- 不 平:〈《新空氣》與《威克烈》〉,《星期日》第26號,1920年1月4日。
- 不 平:〈無政府的國民〉,《星期日》第21號,1919年11月30日,頁碼不詳。
- 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資料(修訂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年,頁773-778。
- 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吳虞日記(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 今 是:〈社會主義的勞動問題〉,《星期日》第22號,1919年12月7日,頁1。
- 巴 金:〈小小的經驗〉,《文學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頁1077-1081。
- 巴 金:〈片段的記錄〉,《大公報》(天津)第12版,1936年4月1日。
- 巴 金:〈我的幼年〉,《中流》第1卷第1期,1936年。
- 巴 金:〈信仰與活動——回憶錄之一〉,《水星》第2卷第2期,1935年,頁114-118。
- 毛一波:〈川南師校雜憶〉,《四川文獻》(臺北)第124期,1972年。
- 毛一波:〈毛一波致阪井洋史信〉,1981年11月5日,轉引自阪井洋史:《巴金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 毛一波:〈難忘的回憶〉,收於丹晨編:《巴金評說七十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6年,頁25-30。
- 王右木:〈王右木致團中央負責人的信——關於成、渝、川北團的籌

- 建情況) (1922年10月11日)，收於中央檔案館等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群團文件)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北京：中央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1986年，頁3-20。
- 王右木：〈王右木給施存統的信(三)〉(1923年夏)，收於中央檔案館等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群團文件)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北京：中央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1986年。
- 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38-219。
- 王汎森：〈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272-280。
- 王奇生：〈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頁90-106。
- 王東傑：〈「不異的異鄉」：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認知中的全國與四川〉，《國中的「異鄉」：近代四川的文化、社會與地方認同》，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20-166。
- 王騰波：〈我追求之路〉，收於政協合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合江縣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1991年，頁117-140。
- 危石頑：〈回憶參加革命活動的經歷〉，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1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6-44。
- 危石頑：〈我參加革命活動的回憶〉，收於中共綦江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中共綦江縣黨史資料彙編》第1輯，綦江：中共綦江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1986年，頁140-164。
- 合江縣誌編纂委員會：《合江縣誌》，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
- 朱近之：〈白屋詩人吳芳吉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收於江津縣文化

- 局編：《吳芳吉逝世五十周年紀念集》，江津：江津縣文化局內部發行，1984年。
- 朱近之：〈我的政治生活歷程〉，收於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五四運動在重慶》，重慶：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內部發行，1984年，頁325-328。
- 艾蕪：〈鼓勵者〉，《艾蕪全集》第13卷，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4年，頁28-37。
- 吳虞：〈吳虞致胡適〉，1920年3月21日，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 廷傑：〈新思潮之研究〉，《蜀聲雜誌》1922年第2期，頁4-7。
- 李元杰：〈惲代英在瀘州建立的第一個「S·Y」支部〉，收於政協瀘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瀘州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瀘州：政協瀘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1983年，頁109-113。
- 李劫人：〈本報的過去和將來〉，《李劫人選集》第5卷，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
- 李蓉：〈對《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的再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期，頁38-48。
- 杜鋼百：〈回憶王右木烈士〉，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6-48。
- 沙汀：〈記老共青團員周尙明同志〉，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23-126。
- 育才：〈改良舊家庭習慣的商榷〉，《星期日》第21號，1919年11月30日，頁碼不詳。
- 周勇主編：《重慶通史》第2冊，重慶：重慶出版社，2014年。



- 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 孟 默：〈新文化運動在四川〉，《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3期，頁36-39。
-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哀 鳴：《極樂地 社會主義小說》，漢口：人道學社，1912年。
- 胡 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期第1版，1919年。
- 唐敦教、陳國衡：〈陳慕勤傳〉，收於中共達縣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鳳麓忠魂 達縣市革命英烈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09-125。
- 孫少侯：〈俄國革命後的覺悟〉，《星期日》第19號，1919年11月23日。
- 孫少荊、錢玄同：〈通信：羅馬字與新青年〉，《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年，頁88-91。
- 狹間直樹：〈五四運動的精神背景——對渾代英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歷史評價〉，《廣東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頁70-78。
- 張仲民：〈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在地化〉，《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 張秀熟：〈《袁詩薈》序〉，《二聲集》，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
- 張秀熟：〈五四運動在四川的回憶〉，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主編：《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頁129-143。
- 張秀熟：〈四川馬克思主義運動先驅者——記王右木烈士〉，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5-34。
- 張 景：〈安那其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活動片段〉，收於中國人民政治

- 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90-92輯第31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頁76-83。
- 張夢九：〈主義問題與活動問題〉，《少年中國》第3卷第8期，1922年，頁57-76。
- 梁娟：《五四前後四川的文化氛圍與新文化的傳播——以華陽書報流通處、〈星期日〉及校園新文化為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 盛明：〈無政府主義在四川的流傳〉，《四川黨史》第31期，1995年，頁45-48。
- 盛紹堯：〈女子的革命運動〉，《星期日》第24號，1919年12月21日，頁1。
- 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與邊緣——《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個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頁54-72。
- 許紀霖：《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 許麗梅：《民國時期四川「五老七賢」述略》，成都：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
- 郭雙林：〈流動的思想：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方法芻議〉，《史學月刊》2019年第6期，頁12-16。
- 陳竹影：〈回憶五四運動在成都的二三事〉，收於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集粹》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間不詳，頁503-508。
- 喻亨仁：〈盧劍波傳〉，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合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等編：《合江縣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合江：政協合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2年，頁31-47。
- 童魯：〈童魯給劉仁靜、林育南的信——關於重慶工人罷工〉（1923年11月14日），收於中央檔案館等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 （群團文件）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頁135-156。
- 曾業英：〈民元前後的江亢虎和中國社會黨〉，《歷史研究》1980年第6期，頁43-59。
- 舒君實：〈五四運動時期成都的進步刊物《半月刊》〉，收於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辦公室編：《五四運動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
- 陽翰笙：〈出川之前（下）〉，《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4期，頁23-28。
- 辟武：〈什麼叫主義？〉，《星期日》第18號，1919年11月9日。
- 管文虎：〈試述成都早期無政府主義組織的革命活動〉，《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頁67-75。
- 劉宗靈：〈從「並行不悖」到「百川歸海」——四川地區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聚合之途及群體特徵分析〉，《蘭州學刊》2018年第4期，頁16-28。
- 劍波：〈生的「門檻」〉，《宇宙風》第130期，1943年，頁210-211。
- 劍波：〈怎樣去宣傳主義〉，《國風日報·學匯》（北京）第194期，1923年，頁3-4。
- 蔣俊：《略論〈極樂地〉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意義》，《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頁96-108。
- 鄭佩剛：〈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若干史實〉，葛懋春、蔣俊等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939-970。
- 曉星：〈怎樣宣傳安那其主義（未完）〉，《國風日報·學匯》（北京）第155期，1923年3月31日。
- 盧廷義：〈我們的父親〉，收於盧箏、盧劍予編：《我們的父母親》（家庭內部印刷本），盧萬儀先生家藏。
- 盧劍波：〈在合江中學領導罷課抗議軍閥侮辱學生的鬥爭實錄〉，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合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等

- 編：《合江縣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合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合江縣委員會，1988年，頁75-82。
- 盧劍波：《回憶瑣記》（盧萬儀整理本），盧萬儀先生家藏。
- 蕭邦奇著，周武彪譯：《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玄廬）傳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 靜 穆：〈男女的不平等〉，《星期日》第23號，1919年12月14日，頁碼不詳。
- 瞿 駿：〈勾畫在「地方」的五四運動〉，《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11期，頁109-119。
- 瞿 駿：〈新文化運動中的「失語者」——論凌獨見與五四時代〉，《學術月刊》2016年第4期，頁158-168。
- 瞿 駿：〈新文化運動的「下行」——以江浙地方讀書人的反應為中心〉，《思想史》第6輯，臺北：聯經，2016年，頁47-96。
- 羅伯特·達恩頓著，鄭國強譯：《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 Yeh, Wen-hsin.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